

反和平演变十四谈

主编 白西民 王天曙 王崇义

海潮出版社



国际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

(代序)

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屈全绳

深入分析形成我国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严重政治动乱和发生在首都的反革命暴乱的国际大气候，必须重新研究和认识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因为这一战略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主要国际威胁。

一、“和平演变”战略的产生

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之日起，到我国这次发生动乱和暴乱事件的70多年间，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存在着颠

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大体上采取了四种战略。

1、武装颠覆战略。大规模的有5次。第一次(1918—1920)是英、法、美、日等国对苏联的所谓“十四国征讨”。第二次(1941—1945)是德国对苏联的侵略战争。第三次(1945—1954)是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第四次(1950—1953)是美国对朝鲜进而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第五次(1961—1973)是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

2、经济封锁战略。内容包括中断贸易、冻结资财、撤销合同、禁止货运、切断技术交流和停止金融往来等项目和手段，企图从经济上困住社会主义国家，扼杀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战略帝国主义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使用过。其中尤以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时间最长，范围最广，从新中国诞生到中美建交，长达20余年。

3、地缘威慑战略。这实际上是一种军事讹诈战略，是地缘政治学在军事上的应用。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周边地区设置军事基地，长期驻守重兵，凭借地理优势，实行地域包

围，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军事压力，进行政治恫吓。以美为例，它的200多万兵力中，有50余万部署在本土以外；1000多个军事基地中，有三分之一建立在本土以外。亚太地区的南朝鲜、日本、菲律宾，靠近海湾地区的希腊、土耳其，西欧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有美军正规部队驻守。目的就是要造成一种黑云压城的态势，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环境。使其不能专心致志地进行建设和发展。

4、“和平演变”战略。用杜勒斯的说法，就是“用和平的方法”，“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缩短共产帝国主义的预期寿命”。这是帝国主义在其他战略迭遭失败后被迫变化手法，苦心炮制的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战略。在这个战略中，“和平”是表象，“演变”是实质；“和平”是手段，“演变”是目的，“和平”是为“演变”服务的。同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其他战略比较，“和平演变”战略更加阴险，更易于得手，因而更应当引起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警惕。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欺骗性

大。敌人可以在“和平”外衣的掩护下，通过外交活动、经济往来、学术交流、旅游参观、新闻采访、派遣留学生等多种合法途径，进行颠覆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最终目的，而善良的人们则往往难以洞察其奸。二是渗透性大。“和平演变”是一种攻心战略，重点是摧毁社会主义国家年轻一代的精神支柱，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俘虏。古语讲，“攻心为上”，“哀莫大于心死”。年轻一代的信念变了，精神支柱垮了，敌人“和平演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三是麻痹性大。敌人兵不血刃，弹不上膛，就可以通过卫星、电视、电台和各种宣传品，传播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污染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空气和精神环境，甚至制造反对派，诱发动乱事端，使你祸起萧墙，后院失火，脚底下闹地震，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所有这些，只要对我国这次动乱和暴乱作深层透视，我们就不难理解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和平演变”是一种“软刀子杀人”的

“软化”战略，是让对方“自我窒息”的战略，因而是一种具有更大危险性的战略。

二、“和平演变”战略的发展

从40年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到今天逐步成为国际敌对势力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一种主要的、全球性的攻势战略，其间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60年代中期以前是待机阶段。就是窥测方向，寻找时机，准备下手。这期间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出现过失误，发生过问题，但是由于两大阵营的对抗十分激烈，社会主义各国对帝国主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因而帝国主义并没有敢把手伸得太远。70年代中期以前是试探阶段。就是瞅准目标，“火力侦察”，乘机下手。重点是向在改革起步较早的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企图由此得手，扩大突破口。最近10多年以来则进入全面推行阶段。就是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改革开放，调整内外政策，积极发展对外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友好关系，吸收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的时机，明目张胆地推行其“和平演变”

战略。西方政界某些反共要人从唯心史观出发，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看作是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以攻势姿态，通过各种渠道，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从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经济上实行全方位的渗透。企图“促使共产主义向多元制和平过渡”，“朝着自由市场和自由政治的方向发展”，“使共产党国家改变整个政治和经济制度”。为什么“和平演变”的战略今天能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没有忘记从地球上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常言道，“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也持这个态度。这个地球上只能有我资本主义，不能有你社会主义，不是我消灭你，就是你消灭我。与其等你羽毛丰满把我吃掉，不如趁你稚嫩我先把您吃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处心积虑地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下功夫。

一是一脉相承，不离其宗。仅以美国为例，40年来，美国政府的头头脑脑几经换马，但

在“和平演变”这个问题上都未忘记“祖训”，都是承上启下、秉承不怠的。50年代的杜勒斯说，“必须时刻记住”，要通过“和平的方法”，“战争以外的方法”，去“终止”社会主义“这个笼罩着全世界的恐怖的威胁”。60年代的肯尼迪说，“只有通过和平的转变，东欧才能得到自由”，要“鼓励这种逐步的演变”，就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培养自由的种子”。70年代的美国要人说，要“鼓励苏联本身内部的和平演变”；为了“不战而胜”，要“重新加强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工作”；“当他们打开门，伸手去拿他们想要的东西时，我们就竭尽全力把尽可能多的真理塞进门里去”。80年代的里根说，美国“决心要达到在东欧实现自由”的目标，要进行一场“把世界和平和人类自由的美好希望带到美国国界之外的革命”，使社会主义国家变得“有多元化体制”。布什入主白宫后则公然扬言，美国历届政府长期推行的“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是“成功的”，“美国现在的目标要比简单地遏制苏联扩张主义要大得多”。并且公开宣布

支持波兰、匈牙利“自由和独立的浪潮”，“实行民主和多元化”，要苏联也“朝着开放社会演变”。

二是彼此呼应，互相配合。“和平演变”之所以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武器，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是他们的共同敌人，实现这一战略是他们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因此，尽管他们相互之间在其他方面时有矛盾和纠葛，但在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上则配合默契，十分卖力。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就说过，要使“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在和平的气氛中通过演变而逐渐削弱”，西方推行“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政策”，是要“加速”另一个阵营的“转变”。为了协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行动，布什的一位安全顾问还建议“各国不要各行其是”，“要避免互相踩脚”。这次我国发生动乱和暴乱的前前后后，“美国之音”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介“一犬吠影，群犬吠声”的表演，就是一个最有力的实证。

三是超前渗透，全球推进。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对社会主义力量的日益强大，始终是心惊肉跳，寝食不安的。为了遏制社会主义思潮向第三世界的传播，使一些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胎死腹中，他们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也在加紧进行。一位美国要人就直言不讳地说，美国过去对第三世界国家“只是在革命之火一旦烧起来以后才动手去扑灭它”，今后，“必须学会根本不让它烧起来”。他还说“我们不仅应阻止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的扩张，我们的政策还要谋求在那里扩大自由”，在“第三世界的那些地区建立能同苏联宣传直接竞争的类似电台”；“必须放手地寻求各种机会，把第三世界中不可避免的变革的能量，引导到和平革命而不是暴力革命”。里根更为露骨地鼓吹“美国在自由方面获得的成功”，“可以在一百个不同的国家重复实现一百次”，这是美国的“伟大的计划和伟大的梦想”。帝国主义这种超前渗透的做法，不仅加剧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困难，破坏了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恶化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环境。

2、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尚未充分发挥，

使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和平演变”战略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和平演变”战略40年来之所以能够沿袭发展，除了帝国主义本身在推行这一战略中的继承性、协同性和全球性以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和平演变”战略“坐胎”的土壤和气候，也是一个不能排除的重要方面。

一是作为根本制度而确立的社会主义还不够完善和成熟。资本主义如果从英国资产阶级1648年取得统治地位算起，迄今已经历了将近三个半世纪，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只有70余年的历史。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优越性是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但是，这种制度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从不够完善到逐步完善，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实践和发展过程。它的弱点和不足，也只能在这个实践和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克服和充实。而帝国主义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不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就想抓住时机，用“和平演变”的战略扼杀社会主义制度。

二是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着敌对势力和

不安定因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误和困难，历来都是采取落井下石的办法。而失误又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少数信念不坚定的人产生了离心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世界的“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元化、人权人道化”等错误思潮，就很容易使这一部分人上当，甚至把社会主义的暂时困难或前进中发生的失误，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从而站到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内应力量或社会基础。我国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妄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人民民主专政，贬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固然由其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反动立场所支配，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他们所采取的攻心战术，使之演变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和代理人，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被视为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新的途径。改革开放是强

国之路，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决不能因噎废食。但是，西方的反共人士根本不可能从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上考虑问题。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分崩离析”和“逐渐消失”，是遇到了“根深蒂固”、“不可救药”的困难。因而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和社会主义国家扩大交往的机会，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打开大门的机会，竭尽全力地把尽可能多的丑恶东西塞进来，让三教九流的人进来，在你的院子里把“潘多拉盒子”打开。正是这种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称之为“历史性机会”的改革开放，才使他们对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寄予了新的期望。

当然，“和平演变”的战略为帝国主义所格外重视，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起作用。但仅就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对此放松警惕，敌人的“和平演变”战略就不只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危险。

三、“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

“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是国际

范围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是两种制度的斗争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我们要在这场斗争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立于不败之地，还必须对敌人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具体做法心中有数。根据手头现有资料，大体可以作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判断：

1、战略步骤——着眼长远目标，力争近期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们十分清楚，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已有70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占世界的1/3，国民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1/4，早已具备了同资本主义抗衡的强大力量。因此，他们虽然不愿意社会主义制度在地球上多存在一天，但要毕其功于一役，在短时期内一举把社会主义国家搞垮，那也是痴人说梦。所以，他们认为，实现“和平演变”“这一目标的最佳办法是分阶段进行”。近几年来，西方国家在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过程中，正是采取了这样一种办法。他们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分阶段地作了长期打算，准备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去实现这一既定目标。但是，他们并没

有因为“和平演变”需要“耐心等待”就坐而论道，相反，总是力图在短时间内在一些局部地区、局部领域有所突破。美国前副国务卿怀特黑德去年就鼓吹，美国及其盟国要抓住“历史性机会”，加快“推进东欧和平的、积极的变革”。美国政府在我国发生动乱和暴乱中所起的作用，布什在波兰大选帷幕刚刚落下就前往访问等事实，都充分说明了他们渴望“和平演变”战略在近期内能有所突破的不可自控的紧迫心态。

2、总体布局——加快突破波、匈，全力颠覆东欧，重点渗透中国。西方大国政府要人及其幕僚妄图从东欧国家打开“和平演变”的缺口，是由来已久的，是从世界格局的总体态势考虑的。二次大战结束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一批国家的建立，丘吉尔就主张把遏制共产主义的重点放在东欧，自此以后，西方一些国家一直沿袭了丘吉尔的这一主张。肯尼迪认为，“只有通过和平的转变”，“才能把苏联人在东欧的主权拿过来”。布什也极力主张“贯彻对东欧国家所奉行的区别对待的政策”，

以促使更多的国家对“要求自由的呼声作出响应”。特别是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的出现，今年团结工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雅鲁泽尔斯基仅以一票之多当选总统，代表波兰统一工人党出任总理的基什查克被迫辞职，团结工会成为左右波兰局势的一股主要政治力量，以及匈牙利宣布实行多党制等等，被西方国家看成是“和平演变”战略的“突破性进展”。所以他们想竭力加快步伐，促使东欧“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渗透和颠覆，始终把我国看成他们实现“和平演变”战略的最大障碍和主要目标。早在1958年，杜勒斯就警告西方世界，“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鼓吹要“用和平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

3、主要手段——为了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十分狡猾的手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加强心战攻势。主要是宣传资本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文化形态，贬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把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搞

乱，把人的思想搞乱。敌人十分清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说到底是在争取人心的斗争，是争夺精神支柱的斗争。所以他们对进行心战极为重视。杜勒斯曾经鼓吹，“美国之音”和其他机构应该“挑起”铁幕后面各国人民的抵抗情绪。有的美国要人则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诬蔑为“淋巴腺鼠疫”，鼓吹“通过人员互访”、“交换书籍”、“相互广播”等方法，“逐渐侵蚀”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这几年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几度泛滥，实际上就是这种心战进攻的恶果。特别是在我国发生动乱和暴乱期间，美国宣传机构在这方面的表演更是猖狂和露骨。“美国之音”不但在对华广播中增加新的频率，延长播放时间，而且通过印度洋和太平洋上两颗国际通信卫星，频繁发射可以覆盖我国整个国土的电视信号。

二是培植内应势力。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在对方国内培植反对派，鼓励不同政见者，以便成为他们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借用力量。从杜勒斯提出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国第二代、第三代身上以来，美国历届政府要